从“注力”到“践行”：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隋博文[1]，戚兆坤[1]，谭翔[2,3]

（1. 北部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钦州　535011；2.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广州　510550；3.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南昌　330013）

摘要：新时代新形势下，推动、推广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是实现海养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在通过访谈中国环北部湾地区 6 家海产品合作社的 37 名渔民并获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对影响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因素进行了探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处理及分析，构建了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渔民自身特质、渔民认知等内在因素和消费者偏好、政策支持与管控、海产品合作社嵌入、涉海涉渔企业介入、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外在因素共七大范畴影响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其中，渔民自身特质是内在前置因素，渔民认知是内在导向因素，消费者偏好是市场驱动因素，政策支持与管控是政府保障（规制）因素，海产品合作社嵌入是社会化组织因素，涉海涉渔企业介入是技术服务供给因素，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文化氛围烘托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渔民需要发挥自身特质并提升认知水平，消费者顺应绿色消费理念，地方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海产品合作社发挥服务功能，涉海涉渔企业提供技术及管理指导，渔村加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策略建议。

关键词：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6.4；P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6）03-0141-13

From “Empowerment” to “Practic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ishermen’s Ecological Marine Aquaculture Behavior: 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SUI Bowen[1], QI Zhaokun[1], TAN Xiang[2,3]

（1.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Beibu Gulf University, Qinzhou 535011,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550,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circumstances, promoting and popularizing ecological marine farming

收稿日期：2025-09-26；**修订日期：**2026-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环北部湾地区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与激励机制研究”（22XGL006）；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桂人才办〔2024〕1 号）.

作者简介：隋博文，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海）产品供应链管理

通信作者：谭翔，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食品质量管理

practices among fisherme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farm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37 fishermen from 6 seafood cooperatives in the circum-Beibu Gulf region of China and the acquisition of original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fishermen's ecological marine aquaculture behavior by using grounded theory. Through the coding process and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data, a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ishermen's ecological marine aquaculture behavior i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seven major categories, including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fishermen'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gnition,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consumer preferences, policy support and control, the integration of seafood cooperatives, the involvement of marine and fishery enterpri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fishing villages, influence fishermen's ecological marine farming behavior. Among them, self-characteristics are the internal prerequisite factors, cognition is the internal guiding factor, consumer preferences are the market driving factors, policy support and control are the government guarantee (regulation) factors, and the embedding of seafood cooperatives i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al factor. While intervention of marine and fishery enterprises is the technical service supply facto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fishing villages is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enhancement factor. On this basis, relevant strategic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fishermen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their cognitive level, consumers should conform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consumptio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strengthen policy guidance, seafood cooperatives should play their service functions, marine and fishery enterprises should provide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guidance, and fishing villages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Fishermen; Ecological marine aquaculture behavior; Grounded theory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海水养殖（以下简称“海养”）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生态化海养产品的需求量持续加大，并逐步向生态化海养产品产供链“最初一公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生态化海养是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海洋渔业生产方式，它以生态技术为产供链操作工具，采取生态化海养策略，是现代海养业尤其是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1]；另一方面，作为海洋渔业经济组织的最基本单元，渔民通常以海养或捕捞为主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本研究中的渔民则是指以生态化海养为基础的生产经营性个体，也是生态化海养产品产供链的生产经营主体之一。在此基础上，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可描述为：渔民在一定海洋资源约束和生态技术水平下，为达到一定的海养（生产）目标，遵循不同海养生物间的共生互补原理，在海养方向、规模和方式上采取生态化策略（如利用天然饵料）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内、外影响因素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其行为（决策），而生态化海养行为对生态化海养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鉴于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生态化海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大食物观和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背景下，从渔民视角系统性地探索影响渔民“践行”（以实践行动来实现目标或愿景）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关键“注力”（注入的力量）因素，对理解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完善生态化海养政策以及推动、推广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当前，学界围绕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了深入探讨，主要涉及经济收益、政策引导、渔民认知和禀赋特点等方面。其中，经济收

益是驱动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重要动力，直接反映其行为（决策）的经济理性[2]；政策引导在推进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3]；渔民的认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接受意愿与实践能力[4]。此外，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还受到资源禀赋、渔民特征及海养特点等因素的影响[5]。可见，作为一种通过（或借助）海洋生态环境来可持续养殖经济鱼类的个体行为，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渔民自身特征（如个体能力、价值观和动机）、个体与组织（如政府、海产品合作社、涉海涉渔企业和渔村）之间的关系、外部环境（如消费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等。那么，对于渔民而言，究竟哪些因素综合影响了其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是一个值得从质性研究层面深入探讨的问题。

当前，中国环北部湾地区生态化海养业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海产品合作社及渔民在实践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生态化海养经验。例如，广西北部湾畔合浦县渔民在生态化海养基地开发了“上可发电 – 下可养鱼”的渔光互补模式；广东湛江渔民在红树林区域开展“种养耦合”和“鱼贝藻”多营养层级生态化海养活动；海南海口市美兰区渔民依托咸淡水（海水与淡水的混合）资源构建了“稻鱼虾”立体共生型生态化海养体系。鉴于此，本研究拟运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选取中国环北部湾地区 6 家海产品合作社的 37 名渔民作为调研对象，构建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阐释各因素对该行为的影响机理。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现有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相关的研究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导致在研究其影响因素问题时，变量范畴间界限不明确、关系模糊。针对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研究，目前尚缺乏成熟的变量范畴和理论假设。作为一种自下而上建构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通过观察、访谈或互动等方式收集资料，聚焦于意义、探索和解释，而非通过统计过程或量化程序获得，这为探索性地解析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科学方法借鉴。扎根理论旨在通过对一手的案例（调研）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比较和提炼，从而逐步提升概念及其关系的抽象层次，最终升华为理论[6]。具体步骤是：以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探索社会现象及问题，收集翔实资料，进行分类和编码，构建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并将建构的理论返回到原始资料和实际情境中接受理论饱和度检验，从而增强理论的可靠性。因此，本研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方法，通过设计开放式问卷，获取原始访谈资料，然后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三级编码进行不断地比较与分析，从而构建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1.2　样本数据

一般认为，扎根理论研究样本数量维持在 20 ～ 30 个为宜；而访谈对象主要采用取样方法获得，以此为访谈相关性、真实性和全面性提供保障[7]。按照理论抽样和典型抽样的原则，本研究将案例资料的数据采集点聚焦在中国环北部湾地区的海产品合作社。中国环北部湾地区是发展生态化海养最适宜的区（海）域之一，气候温和、水质优良、生物多样、浅海滩涂广阔、天然饵料丰富。该地区大多数渔民尤其是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渔民，为对接大市场和实现高质高效海养，纷纷加入了海产品合作社。根据样本选取标准，本研究选取该地区 6 家海产品合作社的 37 名渔民，采用个人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对其中 29 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分析，其余 8 份记录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每名渔民访谈控制在 30 分钟左右；全部数据采集工作历时 2 个月（2025 年 6—7 月）。访谈内容包括渔民对生态化海养的认识和开展情况，以及影响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因素。访谈对象（渔民）的信息分布和访谈提纲分别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访谈对象的信息分布

Table 1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of interviewees

特征	分类	人数 / 名	比例 /%
性别	男	26	70.3
	女	11	29.7
年龄	35 岁及以下	3	8.1
	36 ～ 45 岁	8	21.6
	46 ～ 55 岁	15	40.5
	56 ～ 65 岁	10	27.0
	66 岁及以上	1	2.7
受教育年限	6 年及以下	7	18.9
	7 ～ 12 年	22	59.5
	12 年以上	8	21.6
海养面积	＜ 1 亩*	4	10.8
	≥ 1 且＜ 3 亩	13	35.1
	≥ 3 且＜ 5 亩	15	40.5
	≥ 5 且＜ 10 亩	3	8.1
	≥ 10 亩	2	5.4
受访（海产品合作社）渔民	广西北部湾（沿海）	21	56.8
	湛江（沿海）	5	13.5
	海口（沿海）	11	29.7

注：海产品合作社中，广西北部湾有 3 家（钦州、北海、防城港各 1 家）、湛江 1 家、海口 2 家；*1 亩 ≈0.066 7 hm^2。

表 2 访谈提纲

Table 2 Interview outline

序号	访谈主题
1	您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2	您觉得自身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更有利于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
3	周围的环境对您的生态化海养行为影响大吗
4	政府出台的政策对您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影响大吗
5	海产品合作社嵌入对您的生态化海养行为有影响吗
6	当地涉海涉渔企业介入对您的生态化海养行为有影响吗
7	您有没有接受过生态化海养专业知识或技能培训
8	您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资金主要来源是哪里
9	您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2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编码应用的第一步，即对通过访谈获得的原始记录逐句进行编码、贴标签和登录，体现出扎根理论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在编码过程中，首先使用受访渔民的原话整理出初始概念，尽可能地减轻研究者的主观倾向与既有理论的干扰。然后，经反复分析比对，将初始概念中表达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归纳为同一个范畴，这样便得到了比原始概念概括性更强的几个初始范畴，使原始访谈资料所表达的内容更加清晰和简洁，实现概念收敛[8]。本研究围绕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将出现频次较高、代表性较强的原始语句进行编码处理，共得到 38 个初始概念和 22 个初始范畴。为节省篇幅，每个范畴仅节选部分原始资料语句及相应的初始概念，访谈语句的概念化、范畴化过程如表 3 所示。

表 3　开放式编码的过程和结果

Table 3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open coding

原始语句（部分）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我是一个坚定而勤劳的人，认准了生态化海养就会一直做	坚定而勤劳	渔民性格
我乐于接受并愿意尝试生态化海养等的新模式、新方法	尝试海养新模式	
我拥有丰富的海养经验，并经常阅读生态化海养方面的报刊资料，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能	具备专业技能	渔民能力
我正在攻读渔业方面的成人继续教育，需要跟上时代才行	提升知识水平	
提供货真价实的生态化海养产品，一直是我作为渔民的价值追求	追求货真价实	渔民价值观
渔村村委会贴满了养殖用海的政策海报，我通过阅读，受益匪浅	阅读养殖用海政策海报	养殖用海政策认知
我通过广泛学习养殖用海政策文件，提升了自身对科学化、规范化养殖用海的认识	学习养殖用海政策文件	
我通过广播电视和手机接触到了很多生态化海养的理念，自身也感觉比较认同	认同生态化海养理念	生态化海养理念认知
邻里和亲朋好友都在身体力行“践行”生态化海养理念，给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耳濡目染生态化海养理念	
我通过参加来自海产品合作社和涉海涉渔企业等的生态化海养技术培训，加深了对生态化海养技术要领的掌握	掌握生态化海养技术	生态化海养技术认知
我了解了生态化海养技术，感觉开展生态化海养是个技术活	生态化海养是技术活	
地方政府、海产品合作社、涉海涉渔企业等在宣介和推广生态化海养活动时，我了解到他们是有保障渔民权益措施的	了解生态化海养保障措施	生态化海养保障认知
消费者对我们生态化海养产品的多功能价值是比较关注的	关注多功能价值	海养产品特性偏好
由于我们的海养产品是生态化的，现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和认可	重视生态特性	
消费者喜欢购买我们“三品一标”（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达标合格）的海养产品	喜欢品牌产品	品牌偏好
我们的生态化海养产品主打一个品牌效应，消费者也很满意	跟随品牌效应	
消费者认为我们的生态化海养产品价格是“物有所值”的	物有所值	价格偏好
对于我们投入较高的生态化海养产品，即使价格有点贵，消费者也是能够接受的	价格偏高	
对于年龄稍大的消费者，喜欢到离家近的菜市场或超市购买生态化海养产品	线下购买	购买渠道偏好
对于我们的生态化海养产品，年轻消费者似乎更青睐从线上特别是知名网络平台购买	线上购买	
这几年生态化海养政策很好，如政府给的补贴高，我们开展生态化海养很有动力	补贴激励	政策支持
如果没有政策性贷款或保险等生态化海养的相关保障，我可能就不会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	兜底保障	
我们要遵守制度“禁令”，才能确保生态化海养整个过程不逾越“红线”	政府规制	制度约束
政府有关部门定期来为渔民生态化海养水域进行水质检测和产品检测，确保符合质量要求	部门检测	部门监管
政府有关部门对不合格的生态化海养行为及其产品进行处罚	部门处罚	
海产品合作社为我的生态化海养供应统一的天然饵料	统一供应天然饵料	统一组织渔资供应
海产品合作社为我的生态化海养提供工具设施统一采买服务，省了不少钱	统一采买工具设施	
海产品合作社为我的生态化海养活动提供了多样的咨询服务，很有针对性	统一提供咨询服务	统一咨询服务
海产品合作社销路广，是我生态化海养产品的形象代言人和销售总代理	销路代言	统一销售渠道拓展
海产品合作社为我的生态化海养产品销售拓展了原有的空间	拓展销售网络	
目前用于生态化海养的鱼苗，是涉海涉渔企业培育的，我开展海养很放心	培育海养鱼苗	海养鱼苗培育
我的生态化海养模式得益于涉海涉渔企业的结构优化设计	优化设计海养结构	海养模式技术改造
涉海涉渔企业通过生态化技术创新，改造升级了我原有的海养模式	改造升级海养模式	
涉海涉渔企业为我的生态化海养过程管理提供了标准化方案	标准化方案	生态化海养管理标准化
涉海涉渔企业经常派管理专家到我的生态化海养基地进行管理示范	管理示范	
我所在的渔村正重点打造生态宜业宜居和美渔村，激励着我在生态化海养方面要做出自身的贡献	生态和美宜业宜居渔村	人文人居美
我所在的渔村非常重视渔民海养过程中的海洋生态安全防范问题，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海洋生态质量稳中向好	海洋生态优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融入渔村、渔业、渔民（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方面，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潮流	

2.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其目的在于深层次挖掘初始范畴之间的潜在相关关系，使初始范畴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本研究在开放式编码所得到的 22 个初始范畴的基础上，通过主轴编码过程不断比较与分析范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归纳为七大范畴：渔民自身特质、渔民认知因素、消费者偏好、政策支持与管控、海产品合作社嵌入、涉海涉渔企业介入和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其中，性格、能力和价值观反映渔民个体的内在基本情况，归纳为渔民自身特质；养殖用海政策认知、生态化海养理念认知、生态化海养技术认知、生态化海养保障认知集中反映了渔民对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内在了解和认识状况，归纳为渔民认知因素；海养产品特性偏好、品牌偏好、价格偏好、购买渠道偏好代表着消费者的消费爱好或习惯，归纳为消费者偏好；政策支持、制度约束、部门监管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政府保障（规制）条件，归纳为政策支持与管控；统一组织渔资供应、统一咨询服务、统一销售渠道拓展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社会化组织运营框架体系，归纳为海产品合作社嵌入；海养鱼苗培育、海养模式技术改造、生态化海养管理标准化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企业技术服务供给组织体系，归纳为涉海涉渔企业介入；人文人居美、海洋生态优，在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时可起到文化熏陶的独特作用，归纳为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其主轴编码的过程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主轴编码的过程和结果

Table 4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axial coding

初始范畴	主轴编码结果
性格	渔民自身特质
能力	
价值观	
养殖用海政策认知	渔民认知因素
生态化海养理念认知	
生态化海养技术认知	
生态化海养保障认知	
海养产品特性偏好	消费者偏好
品牌偏好	
价格偏好	
购买渠道偏好	
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与管控
制度约束	
部门监管	
统一组织渔资供应	海产品合作社嵌入
统一咨询服务	
统一销售渠道拓展	
海养鱼苗培育	涉海涉渔企业介入
海养模式技术改造	
生态化海养管理标准化	
人文人居美	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海洋生态优	

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提炼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主范畴与子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最终将此类关联合并成概念化模型的过程。基于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的结果，本研究的选择性编码意在围绕“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个核心范畴，厘清其与次要范畴之间的脉络关系。

渔民自身特质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内在前置因素，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倾向。渔民认知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内在导向因素，体现为渔民在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前做出的综合分析及研判，是一种升华或内化版的认知型心理储备[9]。消费者偏好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市场驱动因素，它决定了市场上生态化海养产品供给量，消费市场“热”力对于提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助力作用不容小觑。政策支持与管控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政府保障（规制）因素，能够激励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并确保其合规性。海产品合作社的嵌入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社会化组织因素，合作社能

组织渔民进行统一采购渔资（如天然饵料、工具设施）和销售（生态化海养产品），帮助渔民解决渔资供应及销售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渔民依托海产品合作社提供的海养产品市场价格与销售渠道等，还能够稳定生态化海养产品价格预期，并且能有效提升生态化海养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涉海涉渔企业的介入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技术服务供给因素，有助于渔民更好地掌握生态化海养技术及管理规范。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文化氛围促进因素，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10]。因此，将上述七大范畴对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构建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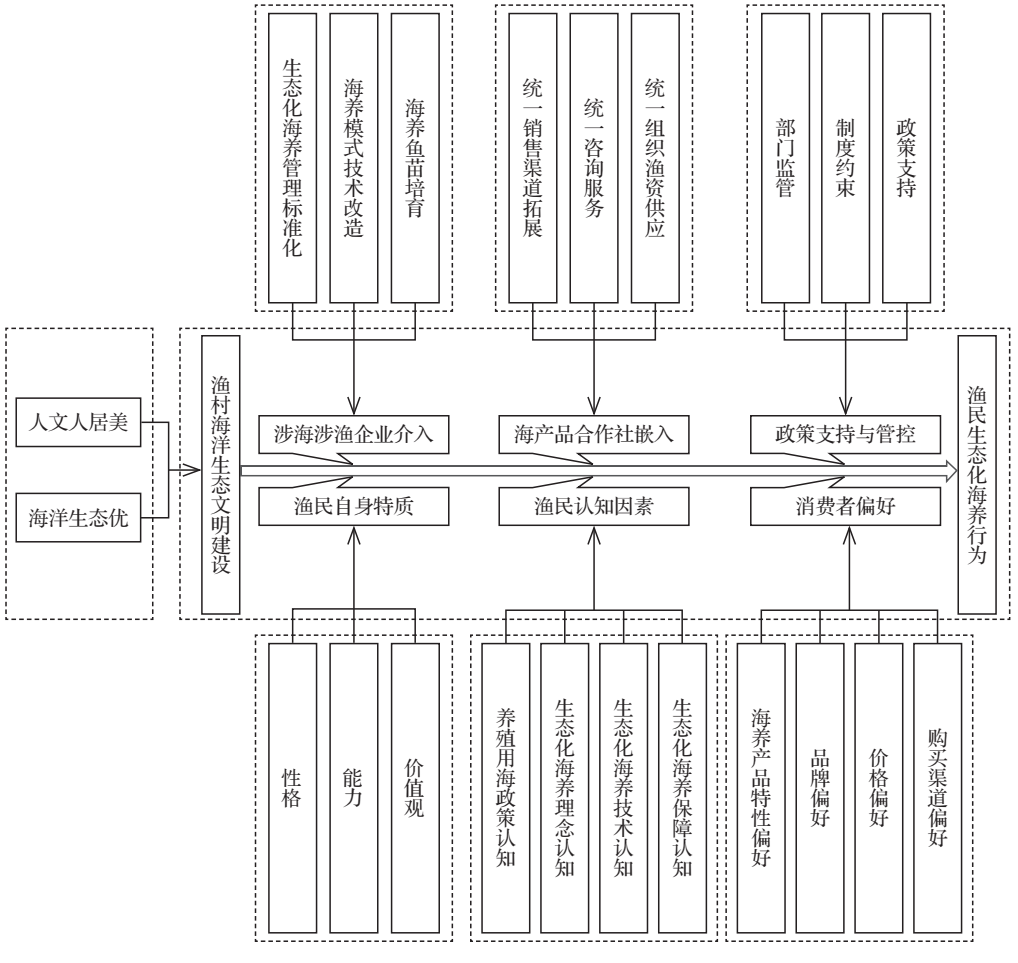

图 1　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Fig.1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fishermen’s ecological marine aquaculture behavior

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在无需获取额外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的特征，并将其作为停止访谈（采样）的判定标准。本研究采用随机抽取后剩余的 8 份问卷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并未发现除七大范畴之外新的范畴和关系，说明影响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因素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和体现。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3　模型阐述

3.1　渔民自身特质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内在前置因素

渔民自身特质是指渔民相对稳定的思想和情绪

方式，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内在前置型驱动因素，包括性格、能力和价值观 3 个初始范畴。其中，性格特质是渔民自身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渔民在面对或“践行”生态化海养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情感和行为方式，如在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乐于与其他渔民分享生态化海养经验等。能力特质是指渔民在生态化海养这一特定领域表现出的技能（能力），包括新技术学习能力、新模式创造力等。价值观特质是渔民自身特质中比较深层次的一部分，反映了渔民对生态化海养行为价值的判断和评价[11]。价值观决定着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导向和原则，对渔民是否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对生态化海养行为价值持积极评价的渔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行为意愿，而对生态化海养行为价值持一般甚至消极评价的渔民，则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传统海养方式。

从调研情况来看，首先，具有坚定而勤劳的性格且乐于尝试海养新模式的渔民，是比较倾向于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其次，渔民的学历和专业技能等成为渔民考虑是否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重要考量；最后，价值观在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实践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正如访谈中提到的，“提供货真价实的生态化海养产品，一直是我作为渔民的价值追求”。

3.2 渔民认知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内在导向因素

渔民对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深入和渐进的过程，相关认知由肤浅到深刻。作为渔民对外界生态化海养信息的感知、理解、记忆和思考过程，渔民认知为其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和方法论指导。渔民认知包括养殖用海政策认知、生态化海养理念认知、生态化海养技术认知和生态化海养保障认知 4 个初始范畴。根据认知行为学理论，渔民关于生态化海养的认知构成了其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根基，渔民个体的生态化海养认知结构和信念系统地塑造了其行为的认知体系，而这些偏好随后会进一步指导并塑造渔民的生态化海养行为（决策）过程[12]。尤其是渔民良好的生态化海养认知，有助于促进渔民采取生态化海养行为（决策），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指南针。分布式认知理论则认为，渔民生态化海养认知分布于渔民个体之间、个体内部、环境和文化等，强调渔民生态化海养认知活动是其个体生态化海养信息加工的过程[13]。

从调研情况来看，一方面，渔民对养殖用海政策（如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 年 12 月下发的《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中特别提到积极推行生态化养殖用海）的认知关乎其是否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此外，如访谈中提到，“渔村村委会贴满了养殖用海的政策海报，我通过阅读，受益匪浅”。另一方面，关于渔民生态化海养理念、技术和保障的认知，在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形成过程中，这三者的认知作用值得重点关注。

3.3 消费者偏好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市场驱动因素

消费者偏好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市场驱动因素，包括海养产品特性偏好、品牌偏好、价格偏好和购买渠道偏好 4 个初始范畴。其中，海养产品特性偏好是指消费者对生态化海养产品这一特定“海养产品”特性的偏好程度；品牌偏好是指消费者对某个生态化海养产品品牌的青睐程度；价格偏好是指消费者对生态化海养产品价格的偏好程度；购买渠道偏好是指消费者对购买生态化海养产品渠道（如全程冷链、“渔超对接”或线上、线下等）便利化的偏好程度[14]。

从调研情况来看，一方面，消费者对海养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对生态化海养产品的需求增加。为满足市场需求，渔民需要不断学习和采用新的生态化海养技术，并更新生态化海养行为方式，以提高海养产品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正如访谈中提到，“由于我们的海养产品是生态化的，现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和认可”“消费者喜欢购买我们‘三品一标’的海养产品”。另一方面，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会导致生态化海养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生态化海养产品的价格，正如访谈中提到，“对于我们

投入较高的生态化海养产品，即使价格有点贵，消费者也是能够接受的”。此外，随着消费者对生态化海养产品产地、环境乃至全流程等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提高，渔民需要更多地与消费者互动，提供详细的生态化海养产品供应链上游信息，以增强消费者信任。

3.4　政策支持与管控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政府保障因素

政策支持与管控有助于推进渔民“践行”生态化海养行为，包括政策激励、制度约束和部门监管 3 个初始范畴。政策支持一般有产业扶持和金融扶持等形式。其中，产业扶持体现在针对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渔业）的专项政策（如旨在帮助渔民拓宽生态化海养产品销售渠道的电商平台建设政策）和资金补贴扶持；金融扶持体现在生态化海养（渔业）贷款和保险等金融服务，以及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渔民的信贷支持力度。

从调研情况来看，首先，地方政府在生态化海养的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等方面不断发力，对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渔民持续提高待遇和福利政策，让更多愿意投身生态化海养实践的渔民更好地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如访谈中提到，“这几年生态化海养政策很好，如政府给的补贴高，我们开展生态化海养很有动力”。其次，制度约束可以对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加以纠偏，使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有规可依、顺势而为[15]，如访谈中提到，“我们要遵守制度‘禁令’，才能确保生态化海养整个过程不逾越‘红线’”。最后，相关部门的监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渔民严格遵照生态化的要求开展海养活动，如访谈中提到，“政府有关部门对不合格的生态化海养行为及其产品进行处罚”。

3.5　海产品合作社的嵌入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社会化组织因素

海产品合作社嵌入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社会化组织因素，包括统一组织渔资供应、统一咨询服务和统一销售渠道拓展 3 个初始范畴。海产品合作社对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有多方位的支持和帮扶。作为生态化海养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者，海产品合作社是渔民基于自愿联合、民主管理而形成的互助性海养经济组织，以渔民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海养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与海养经营有关的咨询服务、海养产品的销售等服务。海产品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组织优势，既可通过技术服务和行为规制提升渔民的生态化海养认知，又能向海养产品市场释放生态化海养产品信息，实现生态化海养产品溢价，从而促使渔民在生态化海养行为上保持一致性。海产品合作社可以聘请海水养殖业专家，组建生态化海养技术服务队，为渔民提供生态化海养技术培训和服务平台，增进渔民对生态化海养行为的认识和了解，提高渔民自身对生态化海养技术的可获得性，进而推动其践行生态化海养行为。海产品合作社嵌入还能使渔民更便利地享受生态化海养专项补贴等政策扶持。

从调研情况来看，首先，海产品合作社可以通过组织化优势，将分散的渔民组织起来，通过统一经营和管理（如统一采购生态化海养设施设备、天然饵料和组织销售生态化海养产品），形成规模经济，提高生态化海养（生产）的市场竞争力和议价能力，降低市场风险，提高生态化海养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渔民的收入。如访谈中提到，“海产品合作社为我的生态化海养提供统一的天然饵料供应”“海产品合作社为我的生态化海养提供工具设施统一采买服务，省了不少钱”。其次，作为海产品合作社成员的渔民，可以共享资源，如生态化海养信息咨询及生态化海养产品市场渠道数据等，降低生态化海养成本，提高生态化海养效率[16]。如访谈中提到，“海产品合作社为我的生态化海养活动提供了多样的咨询服务，很有针对性”“海产品合作社为我的生态化海养产品销售拓展了原有的空间”。最后，地方政府对海产品合作社通常也有一定的扶持政策，如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有助于海产品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也为进一步反哺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需要说明的是，海产品合作社的嵌入对渔民生态化海养行为也可能存在一些风险，如海产品合作社的管理和运营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

验，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可能会导致海产品合作社的运营出现问题，甚至损害渔民的利益；若海产品合作社的规模和实力不足，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市场波动和风险，导致渔民的收入受到影响。

3.6 涉海涉渔企业介入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技术管理因素

涉海涉渔企业介入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技术管理因素，包括海养鱼苗培育、海养模式技术改造和生态化海养管理标准化 3 个初始范畴。涉海涉渔企业介入能够帮助渔民更好地掌握生态化海养技术及管理规范等，促进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涉海涉渔企业往往通过组织化协同创新（如涉海涉渔企业 + 渔民、涉海涉渔企业 + 渔民 + 海产品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和订单式生态化海养产品来助力或引导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17]。一方面，涉海涉渔企业为渔民统一供应海养鱼苗和生态化海养饵料，全程提供标准化生态化海养技术指导；另一方面，涉海涉渔企业以订单联结和合同联结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推行订单式生态化海养，帮助渔民在不增加或少投入成本的情况下实现生态化海养（面积）亩均增收。尤其是“涉海涉渔企业 + 渔民 + 海产品合作社”这一模式，使渔民在获得生态化海养技术支持的同时，通过参与海产品合作社的生态化海养和以涉海涉渔企业为切入点的生态化海养产品一体化产供销链管理，获得比传统海养更高的经济收益。

从调研情况来看，培育和供应渔民生态化海养所需的大量高品质鱼苗，从技术角度对渔民生态化海养模式进行及时改造升级，为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撑，如访谈中提到，“目前用于生态化海养的鱼苗，是涉海涉渔企业培育的，我开展海养很放心”“涉海涉渔企业通过生态化技术创新，改造升级了我原有的海养模式”。此外，涉海涉渔企业对整个生态化海养过程管理的介入，也使渔民在生态化海养方面有了标准参照，为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提供了样板示范，如访谈中提到，“涉海涉渔企业经常派管理专家到我的生态化海养基地进行管理示范”。

3.7 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文化氛围烘托因素

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文化氛围烘托因素，包括人文人居美和海洋生态优两个初始范畴。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指立足资源禀赋、功能定位、景观特色、地域文化及风俗习惯等特性，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渔村”，即围绕“生态优、渔村美、产业特、渔民富、集体强、乡风好”的目标，实施渔村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唱响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渔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追求无污染的海养环境和纯天然的海养模式，始终坚持绿色健康的海养理念，杜绝使用任何人工添加剂或激素，仅使用天然饵料；海洋生态文明会“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地影响渔民自身的态度和行为，能让渔民在不知不觉中向生态化海养行为转变[18]。更为重要的是，海洋生态文明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把渔民联系在一起，以实现人海和谐共生。

从调研情况来看，一方面，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为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如访谈中提到，“我所在的渔村正重点打造生态宜业宜居和美渔村，熏陶着我在生态化海养方面要做出自身的贡献”；另一方面，作为基层组织，渔村（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会把渔民海养行为可能触发的海洋生态问题置于全村工作的突出位置，以引导为主，常抓不懈，为促使渔民“践行”生态化海养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访谈中提到，“我所在的渔村非常重视渔民海养过程中的海洋生态安全防范问题，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4 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基于中国环北部湾地区 6 家海产品合作社的 37 名渔民的深度访谈资料，从渔民视角系统性地解析了影响渔民“践行”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关键“注力”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渔民自身特质、渔民认知因素、消费者偏好、政策支持与管控、海产品合作社嵌入、涉海涉渔企业介入、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不同因素的不同作用点，共同影响甚至决定着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

为。具体而言，渔民自身特质包括性格、能力和价值观 3 个初始范畴；渔民认知因素包括养殖用海政策认知、生态化海养理念认知、生态化海养技术认知和生态化海养保障认知 4 个初始范畴；消费者偏好包括海养产品特性偏好、品牌偏好、价格偏好和购买渠道偏好 4 个初始范畴；政策支持与管控包括政策激励、制度约束和部门监管 3 个初始范畴；海产品合作社嵌入包括统一组织渔资供应、统一咨询服务和统一销售渠道拓展 3 个初始范畴；涉海涉渔企业介入包括海养鱼苗培育、海养模式技术改造和生态化海养管理标准化 3 个初始范畴；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人文人居美和海洋生态优两个初始范畴。研究结论对推动和推广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制定生态化海养的相关策略启示如下。

（1）作为渔民，应全面评估自身性格、能力和价值观等特质，力争发挥个人优势，更好地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开展生态化海养需要渔民具有耐心、细心和责任感，这是因为生态化海养需要渔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时刻关注生态化海养状况，坚持不懈地抓好规范化生产经营。此外，生态化海养更是一种责任，需要渔民本着对生态化海养产品安全和品质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

（2）作为渔民，需要努力提升自身的认知水平，及时有效地加深对生态化海养的理解和认识。渔民需要向“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学习型渔民转变，利用“渔民书屋”和远程教育等形式，不断创新学习方式、拓宽学习渠道，把知识技能的学习与生态化海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根据政策和市场的变化自主地调整生产，有效地规避或降低生产风险，进一步提高兴业致富的本领。

（3）作为消费者，应顺应新时期“绿色消费”理念，在消费时优先选择对海洋环境友好且质量有保障的生态化海养产品，避免购买某些对海洋环境可能有危害的或非生态化的海养产品；同时，消费者可以多参加渔村、海产品合作社和涉海涉渔企业等举办的各类生态化海养体验活动，更为直观地了解渔民的生态化海养过程，使生态化海养产品消费认知从“产品”延伸至“产地”。

（4）作为地方政府，应强化对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引导与指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兜底举措、强化监管，带动渔村（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海产品合作社和涉海涉渔企业等参与其中，逐步建立激励与约束（含监管）并重的促进渔民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长效机制[19]。此外，可以从生态化海养产品供应链的角度对渔民给予政策性补贴支持，协调推进金融机构推出“渔业贷”，解决渔民生态化海养持续投入（尤其是初期投入大）的问题。

（5）作为海产品合作社，应筑牢“为渔务渔姓渔”的宗旨属性和联村带村、联渔带渔的服务特性以及相对完备的组织体系、服务网络，实现“海产品合作社（+ 涉海涉渔企业）+ 渔民”模式的最优资源配置以及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推行“渔民社员 + 积分分红”机制，开展海产品合作社渔民生态化海养“积分争优”活动；邀请有丰富实践经验或在生态化海养领域取得突出业绩的渔民在合作社内开讲座、做报告，推广先进的生态化海养经验。

（6）作为涉海涉渔企业，应持续加大海养鱼苗培育力度，推动科技赋能海养模式升级，提供专业生态化海养技术和管理模式。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涉海涉渔企业 + 海产品合作社 + 渔民”等模式破解当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难题，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海养—收储—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供链，既为开展生态化海养行为的渔民提供新思路、新技术与设备、科学管理方式，又增加其务工收入和其他要素分红。

（7）作为渔村（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应着力打造海洋生态文明实践的鲜活样本与生动示范，深入推进渔村海洋生态文明、宜业宜居和美渔村以及生态化海养“沉浸式”体验区建设，完善生态化海养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做大做强做优生态化海养“一村一品”产业集群。此外，渔村还应鼓励优秀人才返村创业，鼓励返村人才探索生态化海养产品“产供销一体、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模式，实现从生态化海养到加工销售全链条协同布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周思宇，苏治南，夏小明，等．红树林生态养殖模式的生态服务功能协同效果对比研究[J]．海洋与湖沼，2025，56(5)：1110-1121.
ZHOU Siyu，SU Zhinan，XIA Xiaoming，et al．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ynergistic performance of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in mangrove-aquaculture coupling systems[J]．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2025，56(5)：1110-1121.

[2] KUMAR G，ENGLE C，TUCKER C．Factors driving aquaculture technology adoption[J]．Journal of the World Aquaculture Society，2018，49(3)：447-476.

[3] 张群，卢秋佳，魏远竹．海水养殖户发展生态养殖模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105-114.
ZHANG Qun，LU Qiujia，WEI Yuanzhu．Analysis on the willingness of marine farmers to develop ecological aquaculture model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Fujian Tribune，2020(3)：105-114.

[4] LI Jingmei，LIU Wei，LIU Dandan．Constraints，persuasion or incentives? Marine aquaculture farmers' preferences for green marine aquaculture policies based on the choice experiment[J]．Aquaculture Economics & Management，2025，29(3)：359-380.

[5] ZHANG Qun，LIN Junjie，WEI Wenyue，et al．Evolutionary path and influences on marine ecological farming：dual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J]．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2022(1)：3250863.

[6] 毛伟，梁贝贝．海洋渔业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分异及障碍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46(1)：221-235.
MAO Wei，LIANG Beibei．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marine fisheries[J]．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2025，46(1)：221-235.

[7] 樊孝凤，张娇，朱月季．使用合规农药能确保农产品“地头”质量安全吗？基于豇豆农户的扎根理论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3(1)：119-128.
FAN Xiaofeng，ZHANG Jiao，ZHU Yueji．Can the use of approved pesticides ensure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field”?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cowpea farmers[J]．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2025，43(1)：119-128.

[8] 张樨樨，郑珊，余粮红．中国海洋碳汇渔业绿色效率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20(10)：91-110.
ZHANG Xixi，ZHENG Shan，YU Lianghong．Green efficiency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marine carbon sequestration fishery[J]．Chinese Rural Economy，2020(10)：91-110.

[9] 庞洁，靳乐山．生态认知对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1，30(8)：1870-1878.
PANG Jie，JIN Leshan．Impact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on fishermen's willingness to quit fisher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Poyang Lake area[J]．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2021，30(8)：1870-1878.

[10] 刘敏．人海和谐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逻辑[J]．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2(0)：169-182.
LIU Min．The practical logic of human-ocean harmony and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J]．Chinese Ocean Sociology Studies，2022(0)：169-182.

[11] NAHATA K，SATO N，MIYASHITA K．Quantification of fishermen's cognitive values to inform recruitment policies[J]．Marine Policy，2025，174：106593.

[12] 王梦涵，白冰，朱应雨，等．养殖户持续参与培训行为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627个畜禽养殖户的调查[J]．中国畜牧杂志，2024，60(12)：360-366.
WANG Menghan，BAI Bing，ZHU Yingyu，et al．Study on driving factors of farmers'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in training behavior：based on the survey of 627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ers[J]．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2024，60(12)：360-366.

[13] 何坪华，毛成兴．安全风险认知与抗生素违规使用：来自山东省畜禽养殖户的实证检视[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20-29.
HE Pinghua，MAO Chengxing．Safety risk awareness and illegal use of antibiotics：an empirical study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ers in Shandong Province[J]．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8(4)：20-29.

[14] KIM D，CAPUTO V，KILDERS V．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demand for conventional seafood and seafood alternatives：do ingredient information and processing stage matter?[J]．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2023，108：104872.

[15] 孙翔，黄秋蓉，董战峰．海域养殖公共资源治理困境与制度创新：以中国最大天然蚝苗繁育基地钦州湾为例[J]．生态经济，2025，

41(2)：195-202.

SUN Xiang，HUANG Qiurong，DONG Zhanfeng.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governance in marine aquaculture：a case study of the largest natural oyster seedling breeding base in Qinzhou Bay，China[J]. Ecological Economy，2025，41(2)：195-202.

[16] 秦宏，叶川川，张莹. 海水养殖生态经济系统状态评价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 经济问题，2017(9)：100-105.

QIN Hong，YE Chuanchuan，ZHANG Ying. Research on the state of mariculture eco-economic system：a case of Shandong Province[J]. On Economic Problems，2017(9)：100-105.

[17] 杨正勇，徐辉，彭乐威. 产业组织模式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J]. 水产学报，2023，47(4)：168-179.

YANG Zhengyong，XU Hui，PENG Lewei. Effec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on drug use behavior of mariculture producers[J]. Journal of Fisheries of China，2023，47(4)：168-179.

[18] 高范，孙钦帮，于大涛，等. 基于海洋生态文明的海岛生态渔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J]. 海洋开发与管理，2018，35(8)：28-31.

GAO Fan，SUN Qinbang，YU Datao，et al.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island fishing villag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2018，35(8)：28-31.

[19] WANG Zicheng，ZHENG Shan. Can government subsidi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lue Basic Farmland”? Analysis of multi-subject management model in mariculture areas[J]. Heliyon，2024，10(5)：e27059.